

自序

讲到我平生的经历，虽然一方面是曲折崎岖，另一方面却也最简单不过。概括言之，便是世俗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再到学校或学术机关门，如此而已。我的经历，“年表”中已大略言之，这里便不再重复。只是提出几个重点，稍为仔细地谈谈。

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

我在 20 岁以前基本上是爱国主义的思想 认为中国人爱中国，乃是天经地义的事。记得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三省沦陷，海内震动，全国愤慨。当时我正在读初中，闻此巨变，也是义愤填膺，立即写了一篇长约万多字的小说《热血英雄》投寄成都某报 居然刊登出来 连载十多天。内容写的是东北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与日寇作艰苦斗争的故事，虽然纯属凭空构想，却也表现了一个少年的爱国热情。到 1936 年 我又写了一篇题为《芳子姑娘》的小说 约

有七八千字，在当年 10 月的《良友画报》上发表了，得了稿酬大洋 25 元。我毫不犹豫将其中 20 元拿出来，捐献给在绥远前线对日作战的将士。到冬天，又将余钱去买了二三十斤猪肉腌制起来，做成腊肉，带领弟妹们用竹竿扛抬着，全部捐送给了抗战将士。以上所说，约略可以表现我青少年时代爱国主义的精神。

至于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虽是始于 1937 年全民抗战以后，但幼年时也已有了一点萌芽。我读新繁县小时，参加了一个老师们组织的话剧团，在一个公共场所演出了一出叫《苦农夫》的话剧，我演农夫的儿子。当地主管家和狗腿子们前来逼租时，我忽然痛哭号啕，愤怒地扑向前去，对他们又打又咬。按剧情规定：孩子只表现惊怕的样子，我的表演却超出了剧情规定的范围。而这，却是大大成功了，感动了全场观众，连老太婆也在偷偷抹眼泪。第二年年底，全县小学校观摩会考时，作文题出的是《冬天的苦农工》，我写了一个失业工人，大雪天下乡向一个农民弟兄讨债，恰遇这个农民被地主逼租，失业工人在窗外觑见了，长叹一口气，又悄然返回。风雪中他的踽踽行迹，被在高楼赏雪的富翁夫妇瞧见，乃激叹为雪中奇景。因了这篇作文，使我名列全县观摩会考第一。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无产阶级思想在全国发生的影响，使所有知识分子不自觉都在向工农大众倾斜。我读华阳县县立初中时，国文老师也出了这样一道作文题：《苦租谣》。我把题纸拿回家，苦心孤诣，做了整整一个星期，写成一篇约 2000 多字古风体的五言长诗，把广大农民受天灾人祸的苦景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也得

到老师的赞赏和鼓励，给了很高的评分。读协进高中时，和同学们组织协艺游艺团，演马彦祥的《讨渔税》，我反串女角，饰剧中的桂英（因为当时虽然已经男女同校，却还没有开男女同台演戏的风气）。这是一出反映受苦渔民和渔霸作斗争的戏，戏演得很成功，常到外面去演出。在一次庆祝剿“匪”胜利大会上，我们这个剧也拿去演出了，其强烈的反抗倾向竟然未被发现，现在回想起来，既是侥幸，也是对反动派绝大的讽刺。

有了这些萌芽状态的东西，20岁以后逐渐倾向共产主义思想，就不足为奇了。抗日战争初期，因我家院子宽大，余屋尚多，好些同学都住在我家。同学们思想并不一致，各订各的报纸。有订《新华日报》的，有订国民党《中央日报》的。我若要找报纸看，自然首先去看《新华日报》。觉得《新华日报》文章醒豁有力，催人奋进，不像《中央日报》那样官样文章，语言无味，死气沉沉。我的二弟袁靳思想进步，常和左倾朋友往来，我自然无形受他们的影响。二弟这年冬天和几个同学去陕北，我首先支持。筹备好了路费，办好了出门的手续，我亲自送二弟到北门汽车站，看着二弟上了汽车，扬尘滚滚而去，我的心似乎也跟着他们去了。

1938年我随川大疏散到峨眉，在那里参加了川大文艺研究会，这是一个受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的文艺团体。我先被选为研究总干事，后又被选为壁报总编辑。在编辑的任内，我主编了壁报15期，文艺特辑12辑，有什么“诗歌特辑”、“小说特辑”、“散文特辑”、“报告文学特辑”等，真是琳琅满目。那年秋天，我们曾组织了个访问团，带了糖果、

花生之类的东西，向峨眉山下的山居之民作了一次普遍的访问。这时我才看见了农民弟兄真正的贫窶。他们大都和猪鸡等牲畜同住一屋，屋内污秽，褴褛不堪。对于我们带去的礼品，他们并不感到兴趣，却是问我们要一点他们生活所必需的盐。恰好我们未带此物，只得在尴尬的情景中向他们表示歉意。这给我感触很深，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山居之民》在文研会壁报上发表出来，文末说：“盐呀——盐也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可以表现我进一步向共产主义思想靠拢的认识。

后来我因“纵火案”代人受过，无端被指控为“蓄谋纵火”，要开除学籍，赖具有正义感的老师——叶石荪、谢文炳、罗念生、刘盛亚——和同学们的救助幸而获免。我在川大站不住足跟，只得离去，另谋出路。据说那是一场反共高潮时期政治阴谋的大陷害，和我同离川大的老师、同学，共约 400 多人。起初想和一个同学到革命圣地延安去，钱准备好了，车子也联系好了，那个同学却中途动摇，没有认真按分工准备好有关证件，因而没有去成，只好临时转学到成都华西大学。那时许寿裳先生恰好作为中英庚款特约教授在那里授课，使我能幸遇明师。大学毕业出来，我在外县中学和专科学校教了几年书，1945 年国共和谈时期到重庆，与中大、重大等校的同学合办《文化新报》，我被选任社长，标举“争民主、重科学、求进步”为办报宗旨，撰稿人有许寿裳、马寅初、吴组缃等，都是当时知名的进步人士。报纸共出了五期，后因中大迁回南京，我随许师去台湾，报纸也就停刊了。

我在台湾省编译馆作编辑，编写了一套小学国语教科书，其中有“我用小木头，做了一张小桌子……”等歌颂劳动创造的语句，为旧时课本所无。惜“二·二八”事变后编译馆撤销，新编的教科书未能问世。1948年许先生在台湾遭暗杀，1949年初我回到成都静待解放。1950年夏我跟随随军南下的西北艺校同志到重庆去创建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起初教语文和写作实习等一般课程，后来开了一门全院必修的大课“艺术讲话”，要我担当这门课程的讲师。这门课要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还须补充些文、音、美、剧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要求很高。沙汀同志和何剑熏同志都退避了这个讲席，我却自告奋勇地将它承担起来。在教导主任萧秦同志的帮助下，现编讲义，每周按时讲课。我撩起长袍（那时我还未穿干部制服），站在权充讲演厅的大食堂台上，没有扩播器材，放开嗓门，向五六百个年龄、程度不齐的学员授课。效果竟意外地好，每次讲毕，都赢得他们热烈的掌声。当时我曾涌起一阵热潮，口头提出了参加党组织的要求，不知何故，萧主任只是劝我暂缓。本来患有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病的我，趁此也就自我安慰地冷却下来了。以后经过重重运动，尤其是经过1957年整风反右那次反复莫测的运动，眼见我的同行一个个都跌倒了，更是视政治为畏途，安于在神话研究的世外桃源的天地里，去驰骋我的幻想。我曾多次被拔过“白旗”，收效似乎甚微。一个错划为右派的诗人曾惊诧于“袁珂白旗安然无恙”，因为据说那些打黑旗的，打灰旗的，打粉红旗的，打杏黄旗的……都纷纷倒下了。我的自我解嘲是：白

旗是投降的旗帜，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自然可以不倒，可以“安然无恙”。而我实在的心态则是：神话起源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它的精神，是和今天的共产主义息息相通的，我终将不仅在学术研究上，而且还须在实际行动上归到这个总汇去，才算是言行相符。

我家弟兄姊妹一共五人（大妹旭霞已去世），其他四个都是党员，唯独我是白丁，离休的老干部二弟早在七八年前就写信敦劝我申请参加组织，而我总是犹豫不决。一者闲散惯了怕受组织纪律约束，再者自知缺乏斗争精神，不够党员条件，心想到退休的时候递个申请表示我向往共产主义的心意就算了。后来接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特殊津贴，取消了退休之说，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所以在前年我八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就向组织递了入党申请书，幸获批准，不久转正，成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但在我仍只不过是表达心意、贡献余热罢了，实际上我知道我这个党员是不合格的。这就是我从爱国主义曲折地走向共产主义的大概过程。

从文艺创作到神话研究

青少年时代，我本是搞文艺创作的，凡属文艺创作领域里的各种文体，我都莫不尝试为之。我写过诗歌、散文、特写、童话、剧本、通讯报道、文艺评论、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等等。由于主编壁报，还学会了作插图，制刊头，画漫

画。十八般武艺，我仿佛是件件俱能，却没有一样精通。

我研究神话，是从 1948 年在台湾编审委员会作编审时候开始的，当时写了简本《中国古代神话》和论文《山海经里的诸神》。那也是受了茅盾先生《中国神话研究 ABC》的启发，觉得应该把散珠碎玉般的神话资料掇集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件比较完整的东西，普及到读者中去，以发扬曾经璀璨一时的我国古代神话的精神。做这种工作，当时也只是为了排遣寂寞，打发无聊的日子，偶尔为之，并没有以此为终身的职志。

我的奋斗目标，还是在文艺创作。解放初期在西南人民艺术学院任教，教的是“艺术讲话”“写作实习”等课程，间或也写了一些短篇杂文，始终没有离开文学艺术这个圈子。1953 年院系调整，调到作协重庆分会搞专业创作，明确地走上了文艺写作的道路，似乎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实践的结果，却是处处碰壁，不如所望。

1954 年在广汉三水乡体验生活，先后写了《新棉袄》、《搬家》、《新槐村纪事》等篇，均未得到发表。主观原因自然是我的生活基础差，写作的功底不够，客观原因则是当时文艺界“左”的思想浓厚，政治标准定得过高，以致我的作品每每遇到阻碍。以《新棉袄》为例，写一个农村贫穷妇女在解放初期过冬时穿一件蒋匪军遗留下的棉军服，见人羞得抬不起头来，然而为了御寒，又不能不穿。后来参加了互助组、合作社，家庭经济逐渐富裕了，终于脱下了蒋匪军的旧棉军服，穿上了自制的新棉袄，才觉得有了挺起胸膛做人、奔向新社会的骄傲。我是根据目睹的真人真事写的，不

是虚构。自以为是歌颂了新社会的光明，有相当的思想性。然而文章在编辑部就是通不过。参加了几次编辑部特为我召开的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匪军衣服穿在作为贫下中农代表的主人公身上，是丑化了主人公的形象，也丑化了新社会。除此而外，还提出了许多枝节性的意见。我杂采众说，将稿子拿回去改了又改，一篇七八千字的稿子，增补到了一万二三千字，由于没有能够删去那套匪军的衣服，所以稿子始终未能得到发表。这给我是相当沉重的打击，使我有“此路不通”的感觉。

与此情况相反，我的简本《中国古代神话》自从 1950 年年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却是连年再版，到 1955 年，已印行第六版了。出版社为了扩大影响，来函和我商议，要求我将此书增补修订到 15 万字光景。我欣然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征得作协领导的同意之后，就于 1956 年上半年借住到川大去，开始做这件工作。由于在川大图书馆意外地发现先前未收的资料很多，所以我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工作了大半年，全稿就已完成，字数竟达 30 万以上，超出预约的字数一倍有余。此稿寄去，出版社大为赞赏，不到一年便出版了，还给了相当高的稿酬。不久以后，就有了日本和苏联的翻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先后来信，要我为他们编写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神话故事书。一方面是此路不通，另方面却是畅通无阻，于是使我不得不在文艺创作和神话研究二者之间徘徊彷徨了。我想把路子转到神话研究去，但我的工作岗位却是专业创作。神话研究需要到大专院校或科研单位去才更适宜，而我却无调动

工作的机遇。所以我长时期处于尴尬的地位，创作既无成果，神话也不能很好地进行研究。于是只好作些打杂的工作：有时奉派去搜集革命民歌，有时到编辑部去看看稿子，有时又到民间文学研究室去作一个普通工作员。直到 1961 年在一次会议上，基层领导反映我不安心现在的工作，一心想搞神话研究时，做文联领导的沙汀同志为了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当场向大众宣布说：“袁珂同志搞神话研究既然有些成绩，就让他去搞好啦，何必勉强呢！”于是我在作协四川分会（先前是重庆分会）搞神话研究的位置，才相对地确定下来。从此以后不必每天一定去上班了。只有在政治学习或参加某个短期运动时才到单位去。然而我的研究也只能在家里简陋的居室里搞，成了名副其实的“居民段学者”。

居民段学者

我童年时代，就耽于幻想，常常梦见在天空飞翔，水底潜泳，见到些神奇瑰丽的事物。第一次家迁成都时曾住梵音寺街，距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不远，那里有军阀杨森捐资建造的一所儿童图书馆，里面设置有小桌小椅，和琳琅满目的儿童图书。我常到这个图书馆去读书，大都是些童话读物。至今还记得有什么《三大刀》、《黑足男》、《金河王》、《风先生和雨太太》等，曾引起我充分的兴趣。青年时代搞的诸般文艺创作中，童话创作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1947 年被收入许寿裳先生主编的《光复文库》的我的第一部文艺集子，就叫《龙门童话集》。1956 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雁侣》，也是一个童话集子。不过我写的这些童话，大都带有一点讽刺性质，在旧社会，主要是拿它来嘲讽黑暗，鞭打丑恶，比较适合成年人阅读。解放前夕，经许广平先生介绍，在上海《时代日报》上发表了两三篇，记得有《鹅笼》、《影与形》等。

这类童话，在我从青少年时代到接近中年时代，前后一共写了 20 多篇，长短不一，内容各异。除上面所举而外，还有《吉诃德先生在圣殿中》、《云雀的颂歌》、《傀儡的把戏》、《蝙蝠的子孙》、《蛙姐弟》、《鱼腹里的老爷》、《谁最有用》、《发怒的火神》等，大部分都已发表，也有少数几篇被编辑视为“陈义过高”，尚存篋底。在这些童话中，还有一篇《夸父和他的子民》，则径取材于神话，曾被收入 1992 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王招明选评的《中国现代作家神话作品精选》，便是将童话和神话接轨了。按照我广义神话的观点，在神话的最初发生时期，即活物论神话时期，神话、童话、寓言，本来是孪生的三姊妹，是三位一体的东西，无从严格加以区分。我青少年时期喜爱童话，无形中培养了我后来倾向于神话研究的心性。我从一般文艺创作到跟随许老先生作古典小说研究（毕业论文《中国小说名著四种研究》），再进一步缩小范围到小说鼻祖的神话研究，其间还是有脉络可寻，并非纯出偶然。

我的住所，先是在泡桐树街，然后迁居到焦家巷，二地相距不远，都是长方形的院落。泡桐树街房屋狭小，解放初

我从新繁买回的一张中医用的楠木大写字桌，竟无法从小门扛抬进屋去，便把它放在阶沿上，长时间我只好在那里伏案写作。若是文艺创作，倒还方便容易；若是神话研究，需要参考许多文献资料，将一摞摞书籍、纸片抱出来收回去，却是非常麻烦。有碍观瞻姑且不说，冬日天寒，冻手缩脚地在阶沿上吹冷风，亦大是苦景。幸亏一个老朋友来看见了，替我设计，将窗格全部卸下，大写字桌从窗框搬进屋子，又在屋顶开了天窗，以透光线，从此我才有了一个较好的写作环境。搬到焦家巷后，经过动乱的十年，其间政治波折、人事变迁造成的窘境，未遑殚述。重要是家里出了病人，更无异给雪上加霜。1972年从干校牧鸭回来，躲在家编写《中国神话传说辞典》，但干扰不断，时而卡片盒子被掀翻了，得花上半天工夫去清理；时而眼镜不见了，得去寻找眼镜；时而自来水笔被当作武器收缴了，得另去配购水笔；有时正在查阅的工具书，也会忽然被劫夺，就只得暂时望桌兴叹，停工待料。至于家庭生活的紊乱，院子里邻居纠纷的吵嚷，又其余事。这些尚属外部的干扰，论到内部的干扰，则属涯境的暗淡和寂寞，一时看不见“此路可通”的曙光。一切文学艺术乃至学术都被统治在八个样板戏中了，压得透不过气来，遑论神话！几番停止了《辞典》的编写工作，又奋然提起笔来。还是早年的信念占了上风，相信不管道路有多么曲折，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到来，产生于原始社会、其精神又和未来社会息息相通的古代神话，决不会被淹没，它终将要发扬光大的，我的微薄的努力也决不至于白费。

1982年初夏，《中国神话传说辞典》已大致编写完成，我正在作最后的订补工作。某天上午，日本留学生谷野典之(导师王利器)、樱井龙产(导师钟敬文)由杨丽珍同志陪同，突然来访。他们拿了新买的《山海经校注》要我题字留念，我就伏在案上替他们题字，其中一人趁势拿出相机替我拍摄了一张彩照，就是卷首刊载的那张，可以略见“居民段学者”工作的光景。那张书案真可说是十足的杂乱不堪，什么东西都有，宛如一个战争刚结束而没有打扫的战场。我方自歉没有来得及收拾清爽，却被日本青年赞誉为“这才见得是真正的学者”。其实哪里是“真正的学者”，不过是穷窳的居民段学者的写真罢了。编写《中国神话传说辞典》需要查看众多文献资料和冷僻的书籍，我家的环境窘迫，财力不足，只得每天骑了自行车，横穿好几条大街小巷，到省图书馆古书部去查找。有时中午也不回家，就在附近小食店吃点面条、包子，下午又去继续查。查回来的资料忙着编为词条，又得花费许多誊写、修补、剪接的工夫，所以我的案头经常零散着笔头、纸张、卡片、书籍、剪刀、浆糊瓶乃至揩汗的毛巾之类，真像是一个战场。本该每天清理打扫一次的，却恨没有时间，只好任其零乱着。日本青年所见，就是这种光景，长时间我已习以为常了。197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成立，我被调到此间任研究员，领导上在第三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两间房子，又给我配备了一名助手，我和助手各住一间房，我的工作条件这才较为明显地改善了。我在这里以一年多的时间写出了 30多万字的《中国神话史》。

我的师友

我搞神话研究，是自己摸索、冲闯出来的，其间并无直接的师承。许寿裳先生指导我治“小说史”，我对中国几部古典小说名著的研究，就是接受许先生的熏陶完成的。但是许先生却没有指导我研究神话。不但未曾指导，当我把撰写简本《中国古代神话》的设想呈告时，治学一向谨严的许先生还有点不以为然，认为我的想法未免过奢，后来才鼓励我姑且尝试为之。遗憾的是当我将七八万字的稿本杀青时，老师已在台湾惨遭杀害，无法再呈上此稿聆听教诲了。

要说我有师承，那是间接师承于鲁迅、茅盾、闻一多三位大师的。他们在文学和学术上各有其灿烂辉煌的成就，神话研究只不过是其微小的一端，然而我已从大师们的言论、著述中获益匪浅。

鲁迅先生是我终身心仪的革命导师，当 1936 年 10 月我在报端见到先生逝世的消息时，忍不住悲从中来，泪流满面，马上提笔写了《关于鲁迅——我们的“中国之心”》一文表示悼念。在神话研究方面最使我受益的，是先生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见《中国小说史略》）的教诲。经我仔细研究，《山海经》确实是一部巫书，是神话处于多学科综合体混沌形态下的巫书，先生审慎地使用的那个“盖”字可以取消了。又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巫以记神事，

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这对我也有很大启发。它不但准确解释了《国语·鲁语》“家为巫史”“巫史”连文的意义，更阐明了在远古时期神话与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

鲁迅和茅盾两位先生，在对神话范围的广狭问题上，早年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1924年茅盾在《中国神话研究》一文中评英国人威纳所著的《中国神话与传说》说：“它的材料太芜杂，议论太隔膜”，“实在不能叫我们满意”。因为其所取材料乃是《历代神仙通鉴》及《封神演义》之类。但鲁迅在给梁绳祿、傅筑夫的信（见《鲁迅书信集》上卷）中却说：“沈君评外人之作，谓不当杂入现今杂说，而仆则以为此实一个问题，不能遽加论定。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故自唐以迄现在之神话恐亦尚可结集。”信中“沈君”即茅盾先生；“外人之作”即威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看得出来，两位先生早年对中国神话广狭的看法就曾有过一些分歧，鲁迅先生自然看得更开阔、更全面。

茅盾先生1978年10月曾在《人民日报》发表《重印〈中国神话研究〉ABC感赋》一诗，诗中两称“专家”，一则曰“不料专家出后贤”，再则曰“仰望专家阿弥陀”。编者注云：“专家指解放后作《古神话选释》的袁珂同志。”茅盾先生的奖誉和期许使我深受感动。然而其间也不无调侃之意，即“阿弥陀”的“专家”是也。盖古典派神话观的茅盾先生对我的广义神话观是不赞成的。他在唯一的一封复我的信上说：“……但您以为许仙、白娘娘也是神话，我则以为不然。推而广之，魏晋人乃至后来的一些谈玄志怪之书，都不能算

是神话。其理由是这些都与道教有关。尊意以为如何？”先生的观点，几十年以后还坚持如此。

但茅盾先生的《中国神话研究 ABC》（后更名《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收入在 1981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神话研究》中）这部以人类学派方法研究中国神话的名著，对我早期的神话研究却曾有过明显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相信有一部分史家曾将某些神话转化为历史，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则是要将这些历史还原为神话。我在做神话整理工作时，就是沿着这条路子去做的，现在看来这其实也并无大错。《古史辨》派学者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只不过他们在将大量的历史剔除为神话时，做得有些过分罢了。

闻一多先生对语言文字、名物训诂有扎实的功底，治学精神又非常谨严，曾使我无限景仰。他的《神话与诗》和《古典新义》二书成为我案头必备的参考读物，我在《古神话选释》和《山海经校注》中常引用之。所以闻先生也是我间接师承的老师之一。

继三位先生之后，现今犹在的，还有钟敬文先生，他比我年长 13 岁，可说是我的师而兼友，因为在 1963 年全国文联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期读书会上，我们曾经短时期同学。那时组织给我安排的住房和钟老邻近，因而得以时常过往。某个星期天，钟老还特约我一道进城去会见了当时正任《民间文学》主编的贾芝同志。贾芝同志要我给刊物写稿，次年我便有《漫谈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之作，介绍了陈钧同志在四川省中江县搜集整理的三篇古代神话，拙文和陈钧文都发表在当年《民间文学》第三期上。十年动乱时

陈钧的三篇神话成为“大毒草”，以后又编入教科书，俱可见世事沧桑，历史轨迹。1983年上半年去北京参加民间文艺研究会年会，会上提出广义神话的设想，其时大家对此尚多疑虑，钟老独表赞同，并谓先古典派学者的神话议论，都是从德国转输过来的，已经老掉牙齿了。前年我八十寿辰，机关开会祝贺，钟老特从远地亲笔书写一联赠我云：“稽古搜遗殚力中华神话学，修心养性成功东陆地行仙”，落款是“钟敬文时年九十三”。上联自是过誉，下联“地行仙”云云，对我这个患腔穴性脑梗阻腿足极不灵便、行步维艰的人说来，恰成为友情温暖、善意的嘲讽，只好是莞尔心领了。

还有已故的赵景深先生，他是民俗学、民间文学和戏剧学的专家。当1979年我的《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的词目被我院油印了两三百份分寄出去征求意见时，赵老接到，异常高兴，主动来信联系，向我提出了好些宝贵的意见。为“龙门阵”一条词目，我和赵老通过好几次信，也是由于赵老提供线索，使我找到了它的真正出处，顺利地编写成了词条。1983年去上海辞书出版社作《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定稿工作期间，曾去拜望过赵老，不仅得了教益，还从他那里借到《三教搜神人全》的前身《搜神广记》以作比较参考。遗憾的是自从赵老在几年前谢世以后，我再也得不到这种亲切的帮助了。

以下所说，大都是中年学者（有的或者已接近老年）和我交往的情况，其中有些人曾把我当作是他们的老师，我实在愧不敢当，今一律以友视之。

接触最早的，是陈钧同志。他青年投笔从戎，一直在部队工作。1963年7月，他持关于《毛泽东选集》引文用典研究的稿本来，通过文联组织的介绍，要求我替他看稿。他这部40万字稿子，我看了以后，几经修改，后来又经过近30年的风波曲折，1992年终于在广播电视出版社以《毛泽东选集典故》为书名出版了。找我看稿时，我知道他在他的家乡中江县还能搜集到民间流传的古代神话，便要他搜集了几篇，整理出三篇，著文介绍发表在《民间文学》上。从此他走上了研究神话和领导通俗文艺事业的道路。他写了《中国神话新论》，从科学的视角来解释神话，颇多新颖独到之处，甚得海内外学者赞誉。我曾为之作序。又编著《中国神话大观》15集，全书近千万字，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他赞成我的广义神话观点，走的也是广义神话研究的路子。不过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研究神话、写诗作文而外，主要的力量还用在发展通俗文艺事业上。如今他已是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长，该会拥有会员近3000人，遍布于全国各地。我们时常通信往来，他每到成都，必来看访我，来时还要带些珍贵的礼物，很使我过意不去。

萧兵同志也是和我接触较早的，他是淮阴师专的教授，早年曾有不幸的遭遇，经他艰苦努力，自学成才，终于获得丰硕的研究成果，蜚声海内外。他是从研究《楚辞》的角度研究中国神话的，而且用了比较神话学的方法，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文化诸因子都纳入了考察的范围，视野非常开阔。他的著述很丰，单就他送我的书，就有《楚辞文化》、《楚辞的文化破译》、《楚辞新探》、《雉蜡之风——长江